

美国《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报告 百年学术史考察

杜光强 张斌贤

〔摘要〕 1918年,美国内政部教育署发布了《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这份报告直接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对世界中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20世纪美国中等教育的宪法”。报告发布之后,美国学者相继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鲜有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该报告进行历史考察的研究。在对相关史料占用和挖掘分析的基础之上,论文从总体状况、历史意义、报告的思想理念、不同报告间的对比分析、报告应用于实践等维度梳理了百年来研究者们对《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进行研究的历史,剖析了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列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相关主题,指出了从不同侧面推进相关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 《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金斯利;学术史

一、引言

1918年,美国内政部教育署(Bureau of Education)在其第35号公报中发布了《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以下简称“基本原则”),这份由美国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下属的“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历经三年完成的报告,涵盖了重组和改造未来美国中等教育19个方面的主题内容。这份报告应社会转型时期全面改造中等教育的需求而生,直接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对世界中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20世纪美国中等教育的“宪法”。^①

在我国,关于“基本原则”报告的专门研究整体上较少,现有研究程度与报告的重要性还不相匹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对报告全文进行翻译和简单介绍。在瞿葆奎先生所主编的《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卷中首先将报告的核心内容译介过来^②,随后在我国学者所主编的外

杜光强,教育学博士,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36);张斌贤,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100875)。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与美国社会改革(1890—1920年)”(15ZDA25)的研究成果。

① 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ppointed by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pp. 7—31.

②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1—37页。

国教育史教材和著作中也开始对报告进行了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张斌贤等^①对报告进行了全文翻译,清晰地展现出报告的内容要旨;第二,针对报告中的19个主题开展的具体研究,所涉及的主题包括:中学类型^②、中学课程^③、六三三学制^④、中学与大学衔接^⑤、历史意义^⑥等,这类研究占据着主体部分。上述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报告的重要性,但依然没有揭示出报告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一些重要的研究主题还未曾涉猎,例如:报告蕴含的理念和社会思潮、综合中学和综合课程的推广与应用、综合课程与大学入学需求之间的转换与调整,等等。因此,将报告本身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学术史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美国,关于“基本原则”的研究自报告发布之后就开始了,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文献逐渐增多,到60、70年代达到了高峰,而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建立综合中学的研究至今还有学者在讨论。这些研究中,既有从教育通史和课程史的角度对报告进行的线性史研究,也有就某一主题开展的具体研究;既有与以前发布的教育报告进行对比的研究,也有跟踪《基本原则》应用于实践中的案例研究;既有对报告所要体现的社会思潮和教育理念进行剖析的研究,也有对不同研究结论进行反驳的研究,等等。据此,从学术史角度对报告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客观地去理解这份报告的历史意义,也为后续研究者们开展微观研究提供史料支撑。

二、《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报告总体状况研究

在美国,关于《基本原则》报告总体状况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编年史”研究,另一类是“专题史”研究。在对报告进行整体研究方面,大多数教育通史类和中等教育史类书籍都肯定了报告的历史意义。尼尔森·博辛(Nelson L. Bossing)将这份报告视为中等教育领域的“解放宣言(declaration of emancipation)”;^⑦斯图亚特·诺布尔(Stuart G. Noble)指出:“《基本原则》报告在指导中等学校教学与实践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其它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大”;^⑧埃德加·韦斯利(Edgar Wesley)将《基本原则》视为最受大家欢迎、影响力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份教育报告;^⑨詹姆斯·马尔赫恩(James Mulhern)指出:“这份报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是美国理想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一份教育著作”。^⑩

在早期的期刊上刊载重要论文对报告的整体状况进行研究方面,1919年《学校评论》的编辑以《美国教育署近期发布的三份报告》为题名,概述了报告的重要性,指出:“《基本原则》报告在指导中等教育改革方面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值得所有中等教育阶段的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全文学习。”^⑪1931至1932年间,名为*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Clearing House*的期刊,先后刊发六篇文章回顾了六个全国性教育委员会为推动中等教育改革所做出的贡献,这其中就包含了由卡拉伦斯·金斯利

①张斌贤等:《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报告》,《教育学报》2015年第6期。

②杨孔炽、徐宜安:《美国公立中学发展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104页;杨捷:《西方中等教育综合化:历史与比较的视角》,《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③杜光强、张斌贤:《〈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与美国中学综合课程模式的确立》,《教育史研究》2019年第1期;徐辉:《美国普通中学课程的历史演变》,《外国教育动态》1988年第6期。

④李文文:《美国“六三三学制”研究(1888—1918)》,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5年,第38—41页;戴朝晖:《美国六三三学制形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8年,第31—34页。

⑤周世厚:《美国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多维解析》,《外国教育研究》2015年第7期。

⑥杨帆、张斌贤:《20世纪中等教育的宪法:〈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发表始末及历史演义》,《教育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⑦N. L. Bossing,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55, p. 53.

⑧S. G. Noble, *A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Rinehart and Company, 1955, p. 413.

⑨E. B. Wesley, *NE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p. 299.

⑩J. Mulhern, *A History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mpany, 1945, p. 497.

⑪The Editor, “Three Recent Bullet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Education”, *The School Review*, Vol. 27, No. 2, 1919, pp. 234—235.

(Clarence D. Kinsley)担任主席的九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Nine on the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College)和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1932年,加尔文·戴维斯(Calvin O. Davis)在第五篇文章中指出:“《基本原则》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学课程改革都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这份报告是教育署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多的一份报告来佐证。”^①同年,塞耶(V. T. Thayer)在第六篇文章中指出:“对于《基本原则》报告,至少适用于两种阐释方式:我们可以如实地阅读,仅从它对当时中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价值中去评价;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教育发展的趋势中去较为具体地考察它。”^②与此同时,1933至1934学年,全国教育协会会刊的编辑乔伊·摩根(Joy E. Morgan)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社论来介绍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完成的主要工作、所发布报告在中学的采纳情况,其中就重点论述了七大基本原则的应用情况。^③

在相关重要书籍对报告进行整体研究方面,爱德华·克鲁格(Edward A. Krug)的《美国中学的形成》两卷本(时间分别为1880—1920年和1920—1941年)^④,赫伯特·克里巴德(Herbert M. Kliebard)的《美国课程的斗争》^⑤和《变革课程:美国20世纪的课程变革》^⑥,威廉·雷格(William G. Wraga)《民主的中学》(*Democracy's High School*),哈罗德·斯皮尔斯(Harold Spears)在《今日之中学》(*The High School for Today*)等,都以较大篇幅的形式对报告进行了研究。

在博士论文和相关期刊论文对报告进行整体研究方面,诺亚·西蒙斯(Noah G. Simmons)在《酝酿而生的美国综合中学模式》中详细介绍了报告形成的几个阶段、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指出了报告在指引中等教育向前发展、建立新型中学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⑦戈登·西利(Gordon M. Seely)在《全国教育协会的研究委员会》中,介绍了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的形成背景,核心成员的构成,报告主要内容、基本结论,以及报告发布之后社会各界的评价等。^⑧

在对《基本原则》报告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人物方面,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威廉·雷格是较为著名的代表之一。他先后发表了《基本原则报告的再审视》(*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 Revisited*)、《谁写了基本原则报告?》(*Who Wrote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综合中学和美国教育改革》、《被遗忘的进步主义遗产:基本原则报告的再评述》(*A Progressive Legacy Squandered: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 Reconsidered*)等论文,出版了《民主的中学》等书籍,描述了综合中学在美国的起源,剖析了20世纪各种立法对综合课程所产生的影响,列举了支持和反对综合课程的案例。^⑨雷格指出,《基本原则》报告为综合中学的出现与发展设计了蓝图,通过将专业化和统一化共同视为中学的功能实现了建立综合中学的目标。^⑩雷格还指出:“作为一份奠基性报告,应该从报告产生的背景中去审视它的历史价值。如果过分依赖于二手文献则会失去判断的精准性。此外,通过还原报告发布的历史情景,还可以厘清报告的精神意图,从而更好地评估综合课程的核心要旨,以此来解决社会、教育所

①C. O. Davi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Nine", *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Clearing House*, Vol. 6, No. 9, 1932, pp. 550—555.

②V. T. Thayer,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Clearing House*, Vol. 7, No. 1, 1932, p. 49.

③N. G. Simmons, *The Emerging Design for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1913—1922*, PhD Dissertati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60, pp. 340—342.

④E. A. Krug,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pp. 378—406.

⑤H. M. Kliebard,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4, p. 95.

⑥H. M. Kliebard, *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2002, pp. 39—53.

⑦N. G. Simmons, *The Emerging Design for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1913—1922*, pp. 340—342.

⑧G. M. Seely, *Investigatory Committee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A History of the Years 1892—1918*, Ph. D. Diss.,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1962, p. 8.

⑨W. G. Wraga, *Democracy's High School: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 223.

⑩W. G. Wraga, *Democracy's High School: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p. xviii.

面临的发展难题。”^①

三、《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报告历史意义与争论研究

《基本原则》报告作为美国 20 世纪中等教育的“宪法”，其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报告不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整体来说，支持和肯定的多，争论和反驳的少。正如西蒙斯所言：“报告发布之后的二十年里，关于该报告的讨论铺天盖地而来，但早期主要涉及的是七大教育目标，后期讨论最多的则是专业化和统一化功能，等等。”^②

从宏观层面对报告的历史意义进行研究方面，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指出：“报告重新定义了中学的角色，认为自 1918 年以来，中等教育领域大部分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运动仅仅是这一经典报告脚注的论断是合适的。”^③在克雷明的基础之上，雷格指出：“自 1964 年以来，在教育史和课程史领域里大部分重要和有影响力的作品也只是这一经典报告的脚注而已。”^④克里巴德认为，《基本原则》报告起到了塑造现代中学课程轮廓的作用。^⑤他还进一步指出：“《基本原则》是继十人委员会报告之后，美国中等教育史上达到的又一个新的顶峰的课程改革报告。”^⑥韦布(L. Dean Webb)指出，《基本原则》报告代表了两项重大改革：第一，直接导致了学校用一种共同的文化去融合所有学生；第二，学校课程第一次成为了实现非学术目标的手段。^⑦丹尼尔·坦纳(Daniel Tanner)认为：“《基本原则》报告是中学摆脱大学控制和欧洲教育传统的一份宣言书。”^⑧大卫·泰亚克(David Tyack)指出：“报告充分反映出教育进步主义思想战胜了管理进步主义思想，越来越多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开始成为中学里的选择范畴。”^⑨戴维斯·安格斯(Davis L. Angus)等指出，《基本原则》又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报告中所倡导的综合课程将会给美国教育带来越来越多的教育民主和发展愿景。^⑩

从微观层面对报告中不同主题内容的历史意义进行研究方面，克雷明指出：“报告中所主张建立的一种中等教育机构，将过去仅承担单一升学功能的中学转换为承担多种功能的一种综合性中等教育机构。”^⑪亚历山大·英格里斯(Alexander Inglis)指出，综合中学是《基本原则》对于美国中等教育最为宝贵的贡献之一，综合中学应该是美国中学的标准类型。^⑫尤尔根·赫布斯特(Jurgen Herbst)指出：“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绘制了新的教育哲学蓝图，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学的课程哲学并把综合中学作为实现这一新哲学理念的标准机构。”^⑬西蒙斯详细地阐释了报告所坚持的一些教育主张，例如：拒绝心智训练的理念、增设实用性课程、支持中学按照 3 年初级中学和 3 年高级中学的学制进行划

① W. G. Wraga,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 Revisited”, *Education and Culture*, Vol. 11, No. 2, 1994, pp. 13—14.

② N. G. Simmons, *The Emerging Design for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1913—1922, p. 306.

③ L. A. Cremi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1893—1918”,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 56, No. 6, 1955, p. 307.

④ W. G. Wraga, “A Progressive Legacy Squandered: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 Reconsidered”,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41, No. 4, 2001, p. 495.

⑤ H. M. Kliebard,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 as Archeological Deposit”, *Curriculum Studies*, Vol. 3, No. 2, 1995, p. 207.

⑥ H. M. Kliebard,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 (Third Edition)*, pp. 95—96.

⑦ [美] L. 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陈露茜、李朝阳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210 页。

⑧ D. Tanner,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in American Educati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Vol. 39, No. 5, 1982, p. 611.

⑨ D. Tyack, *The One Best System: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97.

⑩ D. L. Angus & J. E. Mirel, *The Failed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890—1995*,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p. 16.

⑪ L. A. Cremin,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1893—1918”.

⑫ A. J. Inglis,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8, p. 703.

⑬ J. Herbst, *The Once and Future School: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39.

分、支持综合中学,等等。^①

从对立面对报告的内容和历史地位进行论争方面,主要聚焦在三个层面:第一,关于中学类型的论争,是建立综合中学还是分科中学?第二,关于中学课程的论争,是继续大量开设学术性课程还是开设差异性课程?第三,关于如何实施报告中的七大教育原则,认为这七大原则过于模糊和宽泛,缺乏实操性。这其中,最早对报告进行反驳的是大卫·斯内登(David Snedden),1919年5月,他在《学校与社会》上公开对报告进行批评,认为报告的口吻过于温和,是向传统主义的妥协和示弱,指出报告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忽视了当时正在美国如火如荼开展的职业教育拓展运动。^②之后,约翰·拉蒂默(John F. Latimer)指出:“《基本原则》报告中的七大教育目标过于宽泛,不会对中学课程产生太多影响。”^③他还认为,正是由于美国中学课程的综合化和实用性,才导致了教育的失利,进而在与苏联的军事竞赛中处于劣势。他反而认为,十人委员会报告才是美国历史上曾经发布的最具有深远意义、实践性和民主性的教育报告。^④

到20世纪60年代,受克鲁格的影响,人们再次质疑了报告的历史地位,克鲁格认为,《基本原则》报告是社会效率理论和社会控制理论在教育领域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⑤大卫·纳沙(David Nasaw)也指出:“在社会效率理论的影响之下,升入中学的青少年开始增多,学校也因此不得不增开更多课程去满足他们的需求。综合中学这样的一种妥协,实际上是在建立高效的社会分层的过程中以一种名义上的姿态走向所谓的教育民主。因此,这些相互矛盾的发展目标必将导致综合中学走向失败。”^⑥安格斯等认为:“《基本原则》报告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学术的”。^⑦戴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指出,在20世纪之交,美国中学有两种发展路径,其中之一就是十人委员会确定下来的学术性课程,让所有中学生学习历史、文学、科学、数学、语言和艺术等。而另一条路径就是根据学生未来职业的可能开设差异化课程。^⑧

四、《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报告思想理念研究

《基本原则》发布之后,社会各界也对主导报告完成的社会思潮和教育理念进行了研究,可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认为审议委员会完成了这份报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判定也是合理的;第二,认为金斯利是报告的总设计师,报告体现了他在纽约布鲁克林时期的课程思想;第三,认为报告反映了斯内登的一些思想观点,这因为金斯利曾是他的助手;第四,认为报告受到了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杜威等的影响;第五,认为报告深受当时三种强有力的社会运动的影响,即:社会效率运动、科学管理运动和职业主义运动。

克鲁格指出,金斯利是报告最主要的完成者,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那就是斯内登,这从报告所倡导的社会效率理念就可以看出。克鲁格还指出,很难发现杜威对报告有直接的影响。^⑨沃尔特·德罗斯特(Walter H. Drost)指出,报告充分体现了金斯利在纽约布鲁克林时期的改革思想,报告中的诸多内容,例如:综合中学、中学目标、中高衔接等主题在金斯利向纽约市中学教师协会提交的“中学

①N. G. Simmons, *The Emerging Design for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1913—1922, p. 339.

②D. Snedden,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School and Society*, Vol. 9, No. 5, 1919, pp. 519—522.

③J. F. Latimer, *What's Happened to Our High School?*,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8, pp. 73—74.

④J. F. Latimer, *What's Happened to Our High School?*, pp. 116—132.

⑤E. A. Krug,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880—1920, pp. 394—397.

⑥D. Nasaw, *Schooled to Order: A Social History of Public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8.

⑦D. L. Angus & J. E. Mirel, *The Failed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890—1995, 1999, p. 15.

⑧D. Ravitch, *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p. 51.

⑨E. A. Krug,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880—1920, pp. 400—402.

课程修订委员会报告”中都有体现。^①赫布斯特指出:“金斯利对于‘民主’有着特殊的定义,那就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通过获取他们想要的技能和道德情感,去适应社会环境,而金斯利所提倡的综合中学正好成为了实现这种民主的原型。”^②

雷格指出:“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就是将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在此之前所发布的相关报告中的核心内容,总结到《基本原则》中去。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成员的专业特长,将不同主题内容分配给他们修订完善,所以报告是审议委员会共同完成的工作结晶”^③西蒙斯通过阅读英格里斯在1918年出版的《中等教育的原则》后发现,这本书在很多方面与《基本原则》报告有相似性,而英格里斯作为审议委员会中的重要一员,报告的完成有他的思想痕迹。^④

克雷明指出:“斯宾塞所提出的五大教育活动对报告中有直接影响,金斯利进一步将这五大活动扩展为七大教育目标,即:健康、基本技能的掌握、高尚的家庭成员、职业、公民资格、善于利用闲暇时间、具有道德品格。”^⑤诺布尔指出:“在美国,关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讨论一直受到斯宾塞的影响。然而,斯宾塞的思想在美国最具有体现标志的就是1918年发布的《基本原则》报告。”^⑥跟诺布尔一样,其他一些美国教育史学家也认为报告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

乔尔·斯普林(Joel H. Spring)在《美国学校》中指出:“《基本原则》报告受到了社会效率理论的影响,通过使用这种理论意在将美国中学塑造成一种满足现代公司资本主义发展的教育机构。”^⑦拉维奇指出:“一战时,社会效率理论已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得到了广泛接受,这种共识在《基本原则》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⑧泰亚克和拉里·库班(Larry Cuban)也指出:“许多教育者都极力推崇《基本原则》报告,将这份报告视为专门服务于社会效率理论的一个依据和模板,认为学校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职业规划而做出不同准备。”^⑨

五、《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报告实践研究

《基本原则》发布之后,报告中所倡导的一些改革理念和实施方案逐渐成为了各州和学区推动中学课程改革的主要依据和指导原则,已有研究先后从基本原则的指导意义、中学功能的调整、中学课程变化、中学学制改革等方面对报告指导和应用于实践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1925年,全国中学校长协会在加尔文·戴维斯带领下,开展了一项评估《基本原则》报告对中学课程影响的调查活动。戴维斯向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地区的中学校长发放了调查问卷,最终收到了182份有效问卷。分析后发现,有61.8%的校长表示学校课程的调整受到了《基本原则》的影响,尤其是位于美国南部的一些学校。^⑩与此同时,库斯在《美国中等教育发展趋势》一书中也指出,当时一些区域性教育组织发布的报告也明显受到《基本原则》的影响。^⑪随后,卡特·古德(Carter V. Good)在调查美国各州和一些较大城市里的中学1926至1927年度的课程大纲时也发现,很多中学

①W. H. Drost, “Clarence Kingsley—The New York Year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6, No. 3, 1966, pp. 18—34.

②J. Herbst, *The Once and Future School*,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41—153.

③W. G. Wraga, “A Progressive Legacy Squandered: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 Reconsidered”.

④N. G. Simmons, *The Emerging Design for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1913—1922*, pp. 337—339.

⑤L. A. Crem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 1876—195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 93.

⑥S. G. Noble, *A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Rinehart and Company, 1955, pp. 403—404.

⑦J. H. Spring, *The American School, 1642—1990*,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990, p. 206.

⑧D. Ravitch, *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s*, pp. 123—125.

⑨D. Tyack & L. Cuban, *Tinkering Toward Utopia: A Century of Public School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3.

⑩C. O. Davis, *The Curriculum and the Seven Objective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inth Yearbook, 1925, pp. 112—119.

⑪L. V. Koos, *Trends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8—10.

直接或较大程度上将报告中的七大教育目标作为课程设置的基本思路。^① 1928年,全国教育协会督学分部对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学校的1228名校长进行了报告影响力的调查。其中,有689位校长指出,在过去5年里,他们按照报告中的内容进行了课程重组。新增课程类别中,最常见的就是商业课程、社会课程、工业艺术、家政学。呈现出明显衰落趋势的是拉丁语、古代史、法语和高级数学。^②

20世纪30年代早期,托马斯·布里格斯(Thomas Briggs)开展了一项关于中等教育主题的调查,他向全国范围内55所大学里研究中等教育的教授和147所中学的管理者征询了他们正在关注的十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主题。通过研究发现,他们所高度关注的教育主题跟《基本原则》报告中所提到的教育主题极其相近。^③ 海伦·林德(Helen Lynd)在1937年调研了《基本原则》对中学课程总量所产生的影响。在他所调查的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市,中学课程数量从19世纪90年代的20多种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100多种。^④ 塞耶也指出:“为了全面地评估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应将报告中的中等教育理念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教育理念进行对比。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份报告仍然是超越当时社会现实的。”^⑤

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在《今日美国中学》一书的第二章标题中,将综合中学视为美国学校的独有特征。约翰·加德纳(John W. Gardner)在为本书所做的序言中也指出:“综合中学是美国特有的一种现象,这种类型的学校在民主的环境下能为所有青少年提供良好和合适的教育。”^⑥ 塞凡·特齐安(Sevan G. Terzian)在《综合中学的兴起》中讲述了伊萨卡中学在报告的影响下,如何从一所大学预备学校变成一所综合中学,以及如何通过调整课程来推动民主的教育原则在中学里的实现。^⑦ 安格斯和米雷尔指出,受报告中所提出的教育机会均等原则的影响,中学课程从1922年的175门增加到1973年的2,100门。中学课程在1920至197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正是《基本原则》报告中的理念在中学课程领域所取得的全面胜利。^⑧

六、《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报告对比研究

《基本原则》报告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教育界的经典,正因为这份报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研究者们还先后将其与《十人委员会报告》、1983年《国家处于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等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期更全面地了解这份报告的历史地位。

克里巴德从不同角度对十人委员会报告和《基本原则》进行了对比研究,例如:在这两份报告的历史地位上,克里巴德指出,《基本原则》几乎获得了学界的一致认可,而十人委员会报告只在发布初期被认为是体现最高智慧群体的课程报告;^⑨在两份报告所体现的课程理念上,克里巴德指出:当《基本原则》受到欢迎时,也标志着十人委员会报告中的人文主义课程观走向衰落。^⑩在两份报告解决当时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上,克里巴德指出,十人委员会报告的建议更加保守,而《基本原则》的改革建议

①C. V. Good, "The Objective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1926—1927", *Education*, Vol. 47, No. 10, 1927, pp. 585—592.

②E. A. Krug,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pp. 398—399.

③T. H. Briggs, *Secondary Educ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3, p. 250.

④R. S. Lynd &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7, pp. 221—223.

⑤V. T. Thayer,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⑥J. B. Conant,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Toda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59, p. foreword.

⑦S. G. Terzian,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Ithaca High School in Ithaca, New York, 1875—1941*,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0, pp. 80—81.

⑧J. Mirel & D. Angus, "High Standards for all?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Curriculum, 1890—1990", *American Educator*, Vol. 18, No. 2, 1994, pp. 4—9.

⑨H. M. Kliebard,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 (Third Edition)*, pp. 95—96.

⑩H. M. Kliebard,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 (Third Edition)*, pp. 95—96.

更具有前瞻性。人们普遍认为十人委员会报告忽视了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而《基本原则》则普遍被认为满足了现代工业社会民主发展的需求。^①

安格斯和米雷尔指出:相比于十人委员会报告,《基本原则》则应该被认定为是一份更加专业的教育报告,因为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来自于基础教育领域的一线,他们对报告的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② 哈罗德·拉格(Harold Rugg)也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大学的文科教授们浇铸了学校课程的基本模型,课程内容主要是语言和数学。而在《基本原则》报告中,课程的制定者发生了变化,由过去大学教授占主导,变成了中学督学、校长和一线教师成为了主角。^③ 菲利普·考克斯(Philip Wescott Lawrence Cox)在《中等教育的原则》中指出:“十人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中等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为一小部分孩子未来的生活做准备。而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则认为,中等教育完全是为了青少年完满和有价值的生活做准备的。”^④

巴克纳(J. Kamala Buckner)在《伊利诺伊州回应两段中等教育改革行动的历史比较分析》中,对发表于两个不同时段的两份中等教育改革报告进行了比较分析。巴克纳在文中所提到的这两份报告分别为十人委员会报告、《基本原则》报告和1983年的《国家处于危机中》。认为这三份报告有一定的代表性,都代表了不同时段美国中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从课程、教学和成效评价三个维度对报告进行了横向对比分析。^⑤

七、简要评析

回顾百余年来中美两国学者对《基本原则》报告进行研究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对报告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经典力作也相继呈现,这都有利于我们更加客观和全面的去把握这份报告的历史意义。然而,就如许多历史研究一样,伴随着研究文献和研究手段的不断更新,一些新的研究结论和研究问题也会相继呈现,就国内现有研究程度来看,我们认为尚有努力的空间。第一,对《基本原则》报告发布前后的整体情况把握不足,尤其是九人委员会报告对于《基本原则》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研究的较少。金斯利作为九人委员会的主席,在1912年通过全国教育协会发布了九人委员会报告之后,在1913年又通过教育署发布了204所大学入学需求的报告,而当前较少看到这两份报告与《基本原则》之间承继关系的研究。

第二,对于报告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七大基本原则上,在研究视角上多从理论层面对七大原则的重要性进行概述,而如何将七大教育目标融入进中学的课程计划中、以及具体开设哪些中学课程去实现这七大教育目标的研究较少。

第三,《基本原则》发布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完成阶段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开端时期,而现有研究中,从历史语境的视角去考察报告的研究较少。此外,在克鲁格的影响下,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报告反映了社会效率理论的思想,而雷格^⑥在2001年的研究中明确反驳了克鲁格在诠释《基本原则》报告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片面观点。类似的、彼此间相互争论的研究较少。

第四,金斯利作为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的主席和九人委员会主席,在担任这两个主席之前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到担任一个全国性委员会的主席,这样的蜕变之路也

①H. M. Kliebard, *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p. 39.

②D. L. Angus & Jeffrey E. Mirel, *The Failed Promise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1890—1995*, p. 16.

③H. Rugg, *Foundations for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World Book Company, 1947, pp. 630—631.

④P. W. L. Cox,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Boston: D. C. Heath, 1932, pp. 47—48.

⑤J. K. Buckner,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llinois' Response to Two Secondary School Reform Initiatives: 1893—1918 and 1983—2001*, PhD Dissertation,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2003, pp. 2—4.

⑥W. G. Wraga, “A Progressive Legacy Squandered: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Report Reconsidered”.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金斯利的改革思想和中等教育理念得到了全国教育协会和内政部教育署的认可和支 持,而已有研究中鲜有对金斯利这个重要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

第五,从微观层面对报告中所倡导的综合课程模式在各州、各学区具体推广情况的研究明显不足,已有研究也只是用“是和否”进行抽象的回答。此外,关于中学学制改革、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的建立、大学入学需求的变化等与《基本原则》报告之间的关系研究也较少。

最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接下来的高中办学体制要进一步多样化,“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的发展模式”,这就有必要回到历史语境中,探寻开风气之先的美国综合中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综合中学是如何将融合了职业课程和学术课程于一体的综合课程确立为美国公立中学的课程模式?现阶段,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研究透彻,才能够为我国探索多样化高中发展模式提供经验借鉴和改革启示。

(责任编辑:蒋永华)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US Report of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over a Century

DU Guangqiang, ZHANG Binxian

Abstract: In 1918,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within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released the report of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This report has directly affected the direction and process of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reform after the 1920s, and it has also had a broa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secondary education, thus being regarded as “the constitution of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fter its release, American academics have conducted a lot of research on i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produc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In China,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re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history.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mple materials and in-depth analysis, we sort out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by researchers for a century from the dimensions of overall conditio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thoughts of the report, comparative analyses be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repor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port in practice. We also analyze the main problems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identify related issue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and point out the necessity of advancing relevant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aspects.

Keyword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 Kinsley; research history

About the authors: DU Guangqiang, PhD in Education, is Assistant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Beijing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Beijing 100036); ZHANG Binxian, PhD in Education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Chang Jiang Scholars Program,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